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学刊

Annals of the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2008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学刊

Annals of the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2018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学刊

Annals of the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2008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刊(2008)/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所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7-5004-7527-9

I. 中… II. 中… III. 文学研究—文集 IV. I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207232号

责任编辑 郭晓鸿(guoxiaohong149@163.com)

特邀编辑 张 剑 毛小平

责任校对 曲 宁

封面设计 格子工作室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8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9.75 插 页 2

字 数 520千字

定 价 46.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主 编 杨 义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带星号者为执行编委)

包明德	叶舒宪	白 烨*
石昌渝	刘扬忠	刘跃进
吕 微*	孙 歌*	严 平*
张中良*	杨 义	杨匡汉
胡 明*	赵 园	党圣元
高建平*	蒋 寅*	黎湘萍*

目 录

从荷马到冉皮勒：反思国际史诗学术的范式转换	朝戈金(1)
“聆听他的言说”(muthon akouōn)	
——《伊利亚特》里英雄阿基琉斯的智性品格研究	陈中梅(40)
神话与形式	户晓辉(66)
神话：出于爱而真的“第一叙事”	
——纳吉著、巴莫曲布嫫译《荷马诸问题》第四章 之解读	吕 微(108)
基于文化类型的文学史分期论	蒋 寅(154)
诸子还原初探	杨 义(188)
战国楚简与《诗》在楚国的传播	马银琴(224)
“文学”机构与“文学”职官	
——从“文学”名称用法史的一个重要侧面看汉至唐 时期文章“文学”观念的建构	吴光兴(245)
王铨及其家族事迹考辨	张 剑(298)
清代女性道德权威与论辩策略	
——从比较视角兼论对“女性主义”与“反女性主义”的 反思	杨彬彬(323)
“硬译”辨	
——鲁迅“硬译”说的表与里	程 凯(351)
文化母题与海外华文文学	杨匡汉(374)
从殖民历史的重轭到祖灵之地	
——试论舞鹤《余生》的世界	李 娜(404)

——马尔库塞《德国艺术家小说》探析 丁国旗(426)

自然与文化的解构限度

——思考在德里达“之后”..... 金惠敏(445)

Content

From Homer to Arimpil: A Brief History of Epic

Poetry Studies Chao Gejin (1)

“Muthon Akouōn”

—The Character of Achilles in the *Illiad* Chen Zhongmei (40)

Myth and Form Hu Xiaohui (66)

Myth: The “First Narrative” of Love and Truth

—Reading the Fourth Chapter of *Homeric Questions*

by Nagy Lü Wei (108)

The Periodization of Literary Histories Based on Cultural

Types Jiang Yin (154)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f Restoring the Pre-Qin

Philosophers Yang Yi (188)

The Chu Bamboo Slips from the Warring-States Period

and the Spread of *the Book of Odes* in the State

of Chu Ma Yinqin (224)

“Literary” Institutions and “Literary” Officialdom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ncept of the “Literary”

in Han and Tang Essays, Seen from An Important
Aspect of the History of the Use of the

“Literary” Wu Guangxing (245)

A Study of Wang Zhi and His Clan Zhang Jian (298)

Valorization as Rhetoric: Women’s Moral Authority in

“Debates over Women” during the Qing Period Yang Binbin (323)

Lu Xun’s Theory of “Stiff Translation”: Looking at Its

Surface and Beneath	Cheng Kai (351)
Cultural Motive and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Yang Kuanghan (374)
From the Burden of Colonial History to the Land of Ancestors:	
The World of <i>The Rest of My Life</i> by Wu He	Li Na (404)
A Meaningful Beginning: Reading <i>The German Artist-Novel</i>	
by Marcuse	Ding Guoqi (426)
The Limit for the Deconstruction of Nature and Culture:	
Thinking "After" Derrida	Jin Huimin (445)

从荷马到冉皮勒:反思国际 史诗学术的范式转换

朝戈金

内容提要 本文选取学术史上出现的六位著名史诗歌手,通过聚焦于围绕他们而生的“问题”,描摹国际史诗学术演进中的若干标志性转折。这六位史诗歌手是:古希腊的荷马、南斯拉夫的阿夫多、芬兰的伦洛特、古印度的毗耶婆、爱尔兰的莪相以及中国的冉皮勒。“荷马问题”与史诗作者身份的讨论和口传文本衍成的问题,阿夫多等歌手的研究与“口头程式理论”到“口头诗学”的建构问题,伦洛特与“以传统为导向的”史诗文本类型的问题,毗耶婆与大型口传史诗的传承、流布和编订的问题,莪相“伪作”公案与如何吸收和化用传统遗产的问题,冉皮勒演说本及其口头性与中国学者的史诗理论探索,构成了本文以重大国际史诗理论问题的提出和解答为线索的学理性反思。

关键词 史诗歌手 史诗学术史 史诗理论 中国史诗学

你们的心房;倘若有朝一日,

我们人世间其他的漫游者

踏上这个岛屿,询问你们这些姑娘:

所有的流浪歌手中,谁的歌声最甜蜜?

那时你们就会想起我，并且微笑作答：

“一位来自岩石嶙峋的开俄斯岛的盲目老人。”^①

——《荷马诗颂·阿波罗颂》(*Homeric Hymn to Apollo*)

史诗学术研究的历史，大抵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关于“荷马史诗”的议论，是我们历时地考察国际史诗学术的最佳“起点”。原因至少有三：第一，“荷马问题”(Homeric Question)可以说是贯穿19世纪的古典学论战的焦点，直接影响了20世纪史诗学术的格局和走向。第二，荷马研究上承亚历山大时期(公元前3世纪)以来的古典语文学传统，下启20世纪以“口头程式理论”为核心的史诗理论。这上下两千多年间还经历过中世纪、文艺复兴、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历史主义、象征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到后现代形态等此起彼伏的文学思潮的洗礼，积累的研究成果不计其数，影响也最大。可以说，荷马研究承上启下的地位和作用罕有其匹。第三，在晚近的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热潮中，荷马史诗及其关联研究再次成为人们找寻人类表达文化之根的一个“历史书写”的关捩点。可以说，从“谁是荷马”到“谁杀死了荷马”^②，我们似乎可以从一连串的“追问”中梳理出一部由“荷马”导引出来的史诗学术史。

口传史诗的歌手群体，在不同民族和不同传统中，其角色、地位和作用彼此有别。首先是成为歌手的方式和过程就不同。拥有“家传歌手”头衔的人在一些民族中普遍受到尊重，例如在蒙古族和彝族等民族中就是这样。也有通过专门的“歌手学校”从小定向培养史诗演唱艺人的，如在乌兹别克地区所见的那样。在藏族地区，通过“梦托神授”而神奇地成为歌手的传说，则是当地人们所深信不疑的。史诗歌手有专业和业余之别。有以演唱史诗为生的，也有主要依靠演唱兼及其他副业的歌手，完全业余的歌手也比较常见。另外，在有些演唱传统中，史诗歌手还和其他社会角色结合，如史诗歌手同时身兼民间宗教仪式活动的祭司等。一些演唱曲目丰富、作品篇幅庞大、语言艺术造诣很高的歌手被

① 译文引自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徐松岩、黄贤全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0—191页。“开俄斯岛”即“基俄斯岛”的另一译法。

② Victor Davis Hanson and John Heath, *Who Killed Homer? The Demise of Classical Education and the Recovery of Greek Wisdo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8.

陆续发现和研究。如卡尔梅克歌手鄂利扬·奥夫拉、南斯拉夫歌手阿夫多、西非洲歌手法·迪基·斯索阔、我国的柯尔克孜族歌手居素甫·玛玛依、藏族歌手扎巴和桑珠,以及出现在我们文章标题中的卫拉特蒙古族史诗歌手冉皮勒等。他们中多数人与书写传统无缘,却有不少歌手所演唱史诗诗行的总长度,数倍于“荷马史诗”。一般而言,著名的史诗歌手大都熟谙本民族的口头传统,在演述尺度和创编技巧上经验丰富,在现场演述中往往能够针对听众的种种反应来即兴创编或调整自己的演唱内容和叙事策略,日渐形成各自独特的语言风格,也就能动地参与了口头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今天回顾国际史诗学术史,我们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为了反思中国史诗研究自身的问题,回应本土史诗传统所面临的现实遭际,进而更好地参与国际学术对话。因此,在东西方学术传统的链环上,我们“追问”的落脚点必然是与我们多民族活形态的口头史诗息息相关的“21世纪中国史诗学术”及其将来的道路,因此,中国新疆卫拉特蒙古史诗歌手“冉皮勒”在这里成为我们本土史诗传统的一个象征。

在不很长的篇幅中,试图纵论长达数千年的史诗学术流脉,唯有究其大端,把握关捩,方能以点带面,透射整个学术嬗替演进的草图。所以,这里选取了从古希腊荷马到当代中国冉皮勒共六位史诗歌手,通过聚焦于围绕他们而生的“问题”,描摹史诗学术演进中的若干标志性转折。这样的“学术史纵论”也就远离了按照时间线索盘点材料和观点的常见做法。其间得失,有赖于学界方家的评判和指正。

一 “荷马问题”:从作者身份的 质疑到学术传统的嬗变

让我们从开篇那一位来自基俄斯岛的盲者说起。这首颂神诗是出自古希腊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春秋笔法”,他认为此诗系荷马本人所作,并称其中的那位盲歌手所言就是荷马对自己的评价^①。基俄斯岛在“七城争荷马”的纷扰中占尽优势,缘由之一是这个岛以“荷马立达”即“荷马

^①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3.104.4。

的儿子”或“荷马的后代”(史诗吟诵人群体)且他们扬名于“泛雅典娜赛会”^①而名垂青史。被归到荷马名下的《荷马诗颂》(*Homeric Hymns*)是用英雄六音步格律写成的,共有34首赞美诸神的颂诗(ode)传了下来。应当承认,后世学者多认为这些诗出自无名氏之手。可要说到《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身份”问题,情形就大不一样了。因为围绕这个“追问”自古以来就聚讼纷纭,往前可以上溯到亚历山大时期。那时的古希腊学者中被称为“离析者”(Separators)的克塞农(Xenon)和海勒尼科斯(Hellenicus)就指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存在差异和内在不一致问题,从而认为《奥德赛》不是荷马所作^②。就连系统论述过史诗特性的古希腊文论家亚里士多德(生于公元前384年),和断定荷马是口头诗人的犹太牧师弗拉维斯·约瑟夫斯(Flavius Josephus,生于公元37/38年),也都没能给我们提供多少信息,虽然二人谈论过荷马,且生活时代距离“荷马”较近。

18世纪的荷马研究主要围绕着所谓的“荷马问题”而延伸,其发展开启并影响了19世纪乃至20世纪的史诗学术。从本质上讲,“荷马问题”主要是对荷马史诗的作者身份(一位或多位诗人)的探寻,连带涉及荷马和他的两部史诗之间的其他关联性问题。类似的“追问”或“质疑”也跟随着荷马史诗的传播,从希腊扩布到整个西方世界。从“荷马问题”到“荷马诸问题”^③,这种“追问”的线索凝结了国际史诗的学术走向,也映射出这一领域最为重要的学术开拓。

18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不仅关注通俗流行的短叙事诗和民间故事,还逐步形成了这样一种看法,就是认为荷马史诗在被写定之前一定经历过口头传播阶段,而且这个阶段很可能比“荷马”时代要晚许多。意大利启蒙主义哲学家维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就坚决主张,与其说史诗是个别天才诗

① “泛雅典娜赛会”(the Panathenaia):希腊一个十分古老和重要的节日,又译作“泛雅典娜节”。每年夏天在雅典举行一次的称“泛雅典娜节”(The Festival of the Panathenaia),每四年举行一次的称“泛雅典娜大节”(The Great Panathenaia);节日举行日期为雅典历的头一个月里,相当于公元历的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之间,持续数天,旨在颂扬雅典城的保护神雅典娜,并在祭典上进行献祭和仪式。在节日期间,主要举行三项活动:一是祭祀,二是游行,三是竞赛,田径比赛只是其中一项,还有诗歌朗诵比赛,后被音乐竞赛取代。

② [英]吉尔伯特·默雷(Gillbert Murray):《古希腊文学史》第二章,孙席珍、蒋炳贤、郭智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1页及该页的注释①。

③ 见[匈]格雷戈里·纳吉(Gregory Nagy)《荷马诸问题》,巴莫曲布嫫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该著的导论对单数的“荷马问题”和复数的“荷马诸问题”有专门的阐释。

人的作品，毋宁说是一切诗性民族的文化成果。英国考古学者伍德（Robert Wood）发表于1769年的《论荷马的原创性天才》（*An Essay on the Original Genius of Homer*）更径直提出荷马目不识丁，史诗一直是口耳相传的。1795年，德国学者沃尔夫（Friedrich August Wolf）刊印了一篇论文《荷马引论》（*Prolegomena ad Homerum*），随即成为一根长长的导火索，不仅引发了19世纪发生在“分辨派”（Analysts）和“统一派”（Unitarians）之间的论战，同时也成为20世纪“口头程式理论”学派崛起的一个重要远因。

“分辨派”和“统一派”这两个彼此对立的阵营，通俗一点讲，就是“荷马多人说”和“荷马一人说”两派。以沃尔夫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荷马史诗出自多人之手。其主要依据是，荷马史诗里存在的前后矛盾之处，很难认为是发生在由一个人构思完成的作品中；荷马史诗中使用的方言分别属于古希腊的几个方言区；荷马语言现象所显示的时间跨度，远超过一个人的生命周期，等等^①。因他们对荷马史诗的内容和结构进行了分解（analysis），故被称为“分辨派”（又译作“分解派”）。在“荷马多人说”阵营中，还有赫尔曼（Johann Gottfried Jakob Hermann）提出的“核心说（kernel theory）”^②和拉赫曼（Karl Lachmann）提出的“短歌说”（Liedertheorie，或叫作“歌的理论”）^③作为声援。“统一派”的前身是尼奇（Gregor Wilhelm Nitzsch）提出的“荷马一人说”（a single poet Homer），后来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学者司各脱（John A. Scott）等人。他们力主荷马史诗是某位天才独自完成的一部完整作品，有统一的结构和中心化的戏剧冲突观念（比如说阿基琉斯的“愤怒”）。由于他们始终捍卫荷马史诗的完整性与统一性，坚持荷马史诗的“原创性”，因而被称为“统一派”（又译作“整一派”）。此派人数上

① “荷马多人说”的论据在这里得到很好的概括：“至于希腊许多城市都争着要荷马当公民的光荣，这是由于几乎所有这些城市都看到荷马史诗中某些词，词组乃至一些零星土语俗话都是他们那个地方的。”“关于年代这一点，意见既多而又纷纭，分歧竟达到460年之长，极端的估计最早到和特洛伊战争同时，最迟到和努玛（罗马第二代国王——中译注）同时。”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16、439页。

② 核心说：赫尔曼等人认为最早的荷马史诗只不过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核心部分，后来在此基础上不断添加、修订、删改，最终才形成今天我们见到的荷马史诗。比如说，“阿基琉斯纪”是《伊利亚特》的核心部分；“奥德修斯纪”是《奥德赛》的核心。“忒勒马科斯之歌”和“尼基亚”则是他人所作。

③ 短歌说：拉赫曼认为荷马史诗与德国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一样，是由18首古老的短歌（lays）组成的；其他人则认为《奥德赛》由“忒勒马科亚”（Telemacheia）和“尼基亚”（Nykia，即鬼魂篇）等四五首独立的史诗拼凑而成。

不多,学术上也不够严密,其学说更多地建立在主观臆断之上。

正是两派之间的口诛笔伐,构成了几近纵贯整个19世纪的“荷马问题”的主要内容。“分辨派”和“统一派”都试图对“荷马问题”做出解答,只不过学术立场不同(实则为语文学立场与文学立场之抵牾),所持方法各异,追问路径分歧,观点也就相左。当然,还有一些介乎两端之间的取态,认为荷马史诗不是诗人荷马独自完成的,但“他”在史诗定型中发挥过相当大的作用。在古典学领域的后期争论中,有分量的著述是威拉摩维支—墨连多尔夫(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的《荷马考辨》(*Homerische Untersuchungen*, 1884),其精审翔实的考据充分显示了“分辨派”学术的顶级功夫。他以语文学考释的绵密和对史诗的历史、传播和语体风格变化的出色把握,对《奥德赛》进行了精细透彻的剖析,加之他较为开放的学术视野,在不经意间搭建起了一座“看不见的桥梁”——在某种程度上缩小了长期横亘在论战双方之间的“沟壑”。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统一派学者艾伦(Thomas W. Allen)的《荷马:起源与传播》(*Homer: the Origins and the Transmission*, 1924)出版,促使同阵营中的其他学者也开始正视并部分地接受分辨派学者的某些观点。两派学者逐步调整自己的立场并吸纳对方的意见,一步步走向了学术上的某种建设性的趋同,随后便形成了“新分辨派”(Neoanalysts)和“新统一派”(Neounitarians)。于是,长期困扰荷马研究界的“针锋相对”走向缓和。不过,古典学界多持此见解:“分辨派这一学派以复杂而多相的形态在继续发展,而统一派实质上已成为历史的陈迹。这一微妙的演进走势,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是由于口头理论的出阵褫夺了统一派的立足之地,另外,也还由于分辨派和新分辨派又几乎没有注意到口头理论。”^①

荷马与荷马史诗一直被看作是西方文学的滥觞,其人和其作就成了相互依存的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两个问题。但是,倘若将时空场景置换到今天任何一个活形态的口头史诗传统中,我们就很难去锁定这样的关联,你在民间常常会听到人们这样说:“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诗人,因为人人都会歌唱。”在古希腊的传统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歌者(*aoidós*)和诗人(*poiētēs*,其初始语义为“诗歌制作者”)两个概念的连接。希腊史诗专家陈中梅对这两

① 参见[美]约翰·迈尔斯·弗里(John Miles Foley)《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朝戈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1—12页。

个希腊词做出的语义分析是：荷马不仅称诗人为 *aoidós*（意为“诵者”、“歌手”、“游吟诗人”，该词后来渐被 *rhapsōidoi* 即叙事诗的编制者、史诗吟诵人所取代）；还把歌者或诗人归入 *dēmibergoi* 之列，即为民众服务的人^①。在荷马史诗中，具体提到过的歌者主要有两位，菲弥俄斯和德摩道科斯。Phēmios（菲弥俄斯）^② 一词的本义有可能是“司卜之言”或“预言”；Demodokos（德摩道科斯）^③ 则是“受到民众尊敬的人”。也就是说，歌者或诗人（*aoidós*）是凭借自己的技艺为民众（*dēmos*）服务的人。哈佛大学的古典学者格雷戈里·纳吉（Gregory Nagy）更是以他素有专攻的语文学功力，阐发了古希腊关于歌者、关于歌诗制作、关于荷马之名的词源学含义，同时也令人信服地重构了荷马背后的演述传统、文本形成及其演进过程等诸多环节的可能形态^④。其间他广征博引的若干比较研究案例都深涉歌与歌手、诗与诗人的内部关联，也为我们遥想文本背后的古希腊歌手或诗人提供了一个支点。当我们的遐思从远古回到现实，从奥林波斯回到喜马拉雅或天山，便会发现菲弥俄斯或德摩道科斯离我们并不遥远：桑珠、朱乃、居素普·玛玛依……中国当代的杰出歌手或曰口头诗人，也都堪称我们时代的“荷马”！

总之，从“荷马问题”到“荷马诸问题”的研究构成了特定的荷马学术史（Homeric scholarship），这一研究主题既是古典学（Classics）作为一个学科的组成部分，又是传统人文学术最古老的话题之一。从“谁是荷马”到“谁杀死了荷马”的追问，也为我们大致地勾勒出了国际史诗学术发展的脉络。换言之，正是在这种“追问”的背后，始终贯穿着一种质疑和探求的取向，引导着史诗学术的格局和走向：从作者身份到文本校勘，从跨语际译

① 陈中梅对 *aoidós* 一词做出了语义分析：至少从公元前 5 世纪起，人们已开始用派生自动词 *poiein*（制作）的 *poiētēs*（复数 *poiētai*）指诗人（比较 *poiēsis*, *poiētikē*）。比较 *poiein muthon*（做诗、编故事，参较柏拉图《斐多篇》61b）。与此同时，*melopoios*（复数 *melopoioi*）亦被用于指“歌的制作者”，即“抒情诗人”。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里，*poiētēs* 是“诗人”（即诗的作者）的规范用语。在公元前 5—前 4 世纪的古希腊人看来，诗人首先是一名“制作者”，所以他们用 *tragōidopoioi* 和 *kōmōidopoioi* 分指悲剧和喜剧诗人（即悲剧和喜剧的制作者）。详见陈中梅《伊利亚特·译序》，译林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5—41 页。

② 菲弥俄斯（Phēmios）：忒耳皮阿斯之子，《奥德赛》中出现的一位歌者，为求婚者歌唱，1. 154；奥德修斯对其开恩不杀，22. 330—331，371—377。

③ 德摩道科斯（Demodokos）：法伊阿基亚人中的盲歌手。《伊利亚特》8. 44，《奥德赛》8. 63—64。

④ 见纳吉《荷马诸问题》第三章。

到多学科研究，一代代学者义无反顾地投身其间，以急速增长的学术成果和永不衰竭的探求精神回应着“荷马”从遥远的过去发出的挑战——为什么人们需要叙事，为什么需要同类的叙事，为什么总是需要叙事？只要史诗还存在，有关荷马的“追问”就不会停止，因为这一系列的问号会一直激发人们去索解人类口头艺术的精髓和表达文化的根底。

时间转眼到了20世纪30年代，一位深爱荷马史诗的青年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 1902—1935)也投身于这一“追问”者的行列，为古典学乃至整个传统人文学领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声音”……

二 阿夫多：从歌手立场到口头诗学建构

帕里对荷马问题的索解，引发了古典学领域的一场风暴。他与他的学生和合作者艾伯特·洛德(Albert B. Lord, 1912—1991)，共同开创了“帕里—洛德学说”，也叫“口头程式理论”(Oral Formulaic Theory)。这一学派的创立，有三个前提条件和三个根据地。三个前提是语文学(philology)、人类学和“荷马问题”(古典学)；三个根据地是古希腊、古英语和南斯拉夫。19世纪的语文学，特别是德国语文学的成就，以及西方人类学的方法，特别是拉德洛夫(F. W. Radloff)和穆尔库(Matija Murko)的田野调查成果，开启了帕里的思路。通过对荷马文本作精密的语文学分析，从“特性形容词的程式”问题入手，帕里认为，分辨派和统一派都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荷马史诗是传统性的，而且也“必定”是口头的。为了求证学术推断的可靠程度，帕里和洛德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在南斯拉夫的许多地区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调查。通过“现场实验”(in-site testing)，他们证实了拉德洛夫的说法，即在有一定长度的民间叙事演唱中，没有两次表演会是完全相同的^①。通过对同一地区不同歌手所唱同一个故事记录文本的比较，和同一位歌手在不同时候演唱同一部故事的记录文本的比较，他们确信，这些民间歌手们每次演唱的，都是一首“新”的故事。这些“歌”既是一首与其他歌有联系的“一般的”歌(a song)，又是一首“特定的”歌(the song)。口头

^① “每一位有本事的歌手往往依当时情形即席创作他的歌，所以他不会用丝毫不差的相同方式将同一首歌演唱两次。歌手们并不认为这种即兴创作在实际上是新的创造”。见 Vasilii V. Radlov, *Proben der Volksliteratur der nordlichen turkischen Stamme*, vol. 5; *Der Dialect der Kara-kirgisen*. St. Petersburg: Commissionare der Kaiserli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885.